

儿童说谎行为的类型与研究范式*

戴雨芊^{1,3}, 邱 华², 李 红³

(1. 深圳大学心理学院, 深圳 518060; 2.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成都 610066;

3. 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 成都 610066)

摘 要: 说谎行为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表现, 儿童说谎行为的发展有利于其认知发展, 促进其对社会道德规范的了解和学习, 帮助其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回顾现有的儿童说谎的类型, 包括反社会谎言和亲社会谎言, 介绍儿童说谎的研究范式以更全面地了解儿童说谎的种类, 包括被动说谎范式和主动说谎范式, 并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指出未来可研究方向, 如修改范式、增加对亲社会谎言的研究和对特殊儿童的谎言研究等, 可以更好地理解儿童说谎的发展过程及实践意义。

关键词: 儿童; 反社会谎言; 亲社会谎言; 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 B84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21)03-0204-10

1 引言

说谎(lie-telling)(有时称为欺骗, deception)是一种常见的行为。它是指为了得到某种利益或者避免某种损失而做出的隐蔽且谨慎的行为(Green, 2004)。通俗地讲, 说谎就是有意地编造错误陈述。这种定义既包含了日常生活中的说谎行为, 也包含了游戏中个体使用的策略行为, 如隐瞒、否认、伪造、吹牛、欺诈等各种不同形式的谎言类型(白学军, 章鹏, 张琪涵, 宋璐, 杨宇, 2019)。

儿童的说谎行为是发展心理学最早的研究主题之一, Darwin, Hall, Binet 和 Piaget 等先驱都对儿童说谎这一领域进行了评价、讨论与研究。遗憾的是,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八十年代, 儿童说谎领域的研究记录基本是空白的, 直至1989年才得以继续开展(Lewis, Stanger, & Sullivan, 1989)。20世纪末至今, 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开展依赖于发展心理学的三大重要领域, 即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特定社会文化习俗观念对道德归因、行为解释的影响和儿童证人证词可靠性的研究(Lee, 2013)。儿童说谎研究的再度开展是因为它不仅对于儿童社会认知发展具有理论意义, 比如智力(Lewis, 2015)、心理理论(Leekam, 2004; Polak & Harris, 1999; Talwar, Gordon, & Lee, 2007)、道德认识(Fu et al., 2010)、人格与性格形成(Downey, 1929), 更重要的是它对法律、临床和教育具有实践作用, 比如儿童在法院作

证的能力(Goodman et al., 2006; Talwar, Lee, Bala, & Lindsay, 2002)。达尔文最早通过观察自己的儿子提出, 儿童在大约2岁时说谎(Beeson, Abbey, & Knutsen, 2011)。然而后续的研究大多认为, 儿童说谎行为出现在3岁左右(Evans & Lee, 2013; Talwar & Lee, 2002)。以上研究差异可能是因为研究者们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设定不同的社会情境。

因此, 对儿童说谎的类型与研究范式的回顾有助于我们发现儿童说谎行为的规律, 从而更好地了解儿童的认知发展、道德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归纳常见的儿童说谎类型, 继而探讨常用的几种儿童说谎行为的研究范式, 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不仅可以映射儿童的发展水平与阶段, 也能在法律、临床、和教育等诸多领域实践儿童说谎的应用价值。

2 谎言类型

对于儿童来说, 有两种谎言对他们的社会化进程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一是违反道德规则的谎言, 这意味着要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具有反社会性质; 二是出于帮助他人或者保护他人情感不受伤害制造的谎言, 具有亲社会性质。以下将详细介绍反社会谎言和亲社会谎言。

2.1 反社会谎言

反社会谎言也称为“黑谎”(Black lies), 2~3岁儿童就已开始说这类谎言, 且明白其中的道德含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871130, 31671150), 广东省“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科技专项: 自闭症诊疗方法研究(2018B030335001)。

通讯作者: 邱华, E-mail: angelanna2020@163.com。

义(Bussy,1999;Talwar, Lee, Bala, & Lindsay,2002)。一类研究关注儿童对反社会谎言的划分、理解和道德判断。由于儿童很小就知晓反社会谎言的负面道德影响,所以他们不愿说反社会谎言(Wilson, Smith, & Ross,2010)。另一类研究则关注以“耍花招”(telling lies of trickery)、人身保护或利益为目的的儿童说谎行为(Peskin,1992)。该类研究发现儿童擅长用非言语行为(如撒谎时进行眼神交流)掩

饰自己的谎言,但是却不擅长用言语行为去圆谎。这与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水平有关(Polak & Harris,1999;Talwar & Lee,2008)。还有研究发现,尽管儿童在制造黑谎,但是当告知他们是为了他人在赢得奖励而说谎,即引入亲社会目的时,5岁儿童的说谎概率会提高(Li et al.,2019),儿童的这种行为是亲社会谎言发生发展的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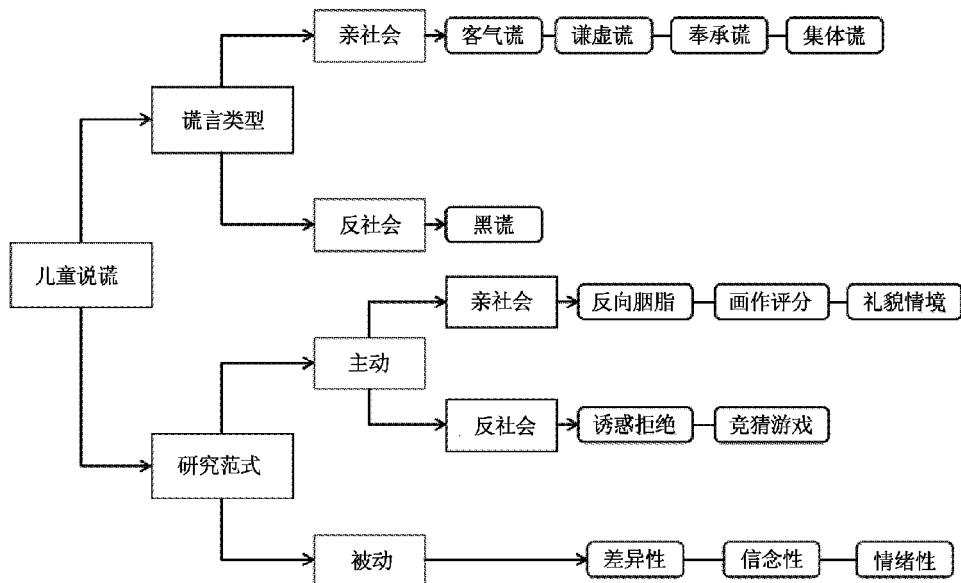


图1 儿童的不同谎言类型与研究范式

儿童说谎并不意味着儿童“变坏了”,相反,说谎有利于儿童的认知水平发展(Ding et al.,2018)。儿童在面对反社会谎言时有两种矛盾心态:第一,由于父母的教导、社会规范的约束和儿童自身道德观的形成,他们不愿去制造任意一个反社会谎言;第二,尽管儿童认为说谎是不对的,但在现实情境中充斥着儿童难以抵抗的诱惑,诱使儿童做出违规行为,为了逃脱惩罚,儿童就会用谎言去掩饰自己的行为,这种谎言被认为是反社会的。这种矛盾又会使得儿童难以自圆其说,从而暴露自己的说谎行为。随着年龄和道德理解水平的发展,儿童解决二者之间矛盾的能力会不断提高(Evans & Lee,2013),且会减少反社会谎言的说谎几率,增加亲社会谎言的频率。

2.2 亲社会谎言

与“黑谎”不同,亲社会谎言的多面性能为儿童的社会发展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Helwig, & Turiel,2011)。儿童想要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制造善意的谎言,就必须学会判断和理解人际交往和社会原则。借助对亲社会谎言的研究,既可以了解儿童在面对规则冲突情境时的权衡策略,也能探讨儿童在不同

社会环境中选择和应用规则的能力。亲社会谎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谎言类型,既具有谎言的基本特征——有意的欺骗性,又有社会性特征——出于保护他人情感或维护自己社会地位的原因而撒谎。

亲社会谎言可以细分为客气谎、奉承谎、谦虚谎和为集体说谎。客气谎指为了避免他人尴尬或者出于礼貌性而编造的谎言,俗称善意的谎言,也称为“白谎”(Walper, Valtin, & Renate,2005)。奉承谎指的是一种讨好行为,指的是为了取悦、缓和和提高接受者的声誉,以让受奉承的对象对自己留下正面印象而夸大自己对他人的赞扬的行为,其本质也是在说谎(Higgins et al.,2003;Fu et al.,2010)。谦虚谎则是一种自谦的行为,其目标是为了通过掩饰自己的成就而避免破坏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在强调谦逊的文化中更为常见(Fu, Heyman, & Lee,2016a)。为集体说谎是为了集体的共同利益而说谎,又称为“蓝谎”,这类谎言在集体主义社会中更多见(Fu et al.,2016b)。

2.2.1 客气谎

儿童在3岁左右就能成功地制造客气谎,且行

为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展,越大年龄的儿童越能成功地制造一个完美的客气谎(Talwar & Lee, 2002; Talwar, Murphy, & Lee, 2007; Xu, Bao, Fu, Talwar, & Lee, 2010)。研究者常用三种方法营造礼貌情境对儿童的客气谎进行探究。一是反向胭脂任务(Reverse Rouge Task)(Talwar & Lee, 2002),儿童会告诉鼻子上有红点的主试他的样子很好,但转而告诉别人事实是相反的。二是对自己的同伴的画进行等级评分,尽管儿童的同伴的画画能力很差,他们往往选择以善意的谎言而不是残忍的真相告诉对方自己的感觉(Fu et al., 2010)。第三种方法则是“不期待的礼物”范式(Talwar, Murphy, & Lee, 2007)。这三种方法虽然对儿童的亲社会性谎言进行了直接地探究,却没有对谎言的动机进行深入探讨。儿童对亲社会谎言的概念理解始于学龄前时期,对亲社会谎言的评价随着年龄变化逐渐由负性转为正性(Bussey, 1999; Walper et al., 2005)。刘秀丽,史华一和张娜(2016)指出,儿童制造白谎出于两种动机:一是自我保护动机,即避免因为说真话而带来的消极影响,如使他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礼貌的人;二是亲社会动机,即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如直接说明不喜欢对方赠送的礼物而使对方感到尴尬。年幼儿童更偏向自我保护动机,而年长儿童则更多地是出于亲社会目的而说谎。对亲社会谎言的概念理解与实际说谎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亲社会说谎者会意识到礼貌的需要,并且避免讲真话的需要以免伤害他人,因而他们决定在礼貌性的情境中使用善意的谎言(Xu et al., 2010)。

因此,儿童的白谎行为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在学龄前早期就已经出现,发生时间非常早,且行为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增多和完善。二是儿童说谎的动机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由利己转为利他倾向。三是儿童的客气谎行为与道德评价密切相关,儿童对亲社会谎言概念理解越正性,越倾向于选择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或感受。

2.2.2 奉承谎

通俗地说,奉承谎就是为了“拍马屁”而说谎。现实中有很多例子,比如儿童在面对权威人物(如老师)时,会出现类似的行为。明明老师唱歌唱得不好,儿童却会称赞其歌声美妙,实验中, Fu 和 Lee 采用对他人的画作进行等级评定的范式来诱发儿童自主说出奉承谎的行为(Fu & Lee, 2007),结果发现儿童的奉承行为主要有如下特点:首先,3 岁儿童对

同一幅成人画作的评价在有大人在场和无大人在场的情况下都给予一致的评价,4 岁儿童则处于过渡期,5 至 6 岁儿童则会在画作的作者在场时夸大对其评分,这说明,学龄前儿童已经学会奉承和讨好行为。其次,一旦儿童学会制造奉承谎,其对象就不仅仅局限于成年人,也会奉承其他的同龄伙伴。第三,儿童对其奉承的对象熟悉程度会影响他们表现出奉承行为的程度,对熟悉的人会表现出更大的奉承,这表明学龄前儿童奉承行为的适应性和情境敏感性。

然而,有且只有这 1 篇研究对儿童的奉承谎行为进行了考察,仍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儿童是否存在清晰的自我意识,知道自己的讨好行为,即说谎的意图性是否明显?其次,儿童对奉承谎的道德评价是怎样的,随着年龄增长又会有怎样的变化?第三,儿童制造奉承谎是否存在文化差异?具体来说,接受不同文化的东西方儿童是否对奉承谎行为的发生发展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和道德评价?这些问题仍处于未知状态,需要更多研究者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2.2.3 谦虚谎

谦虚谎是指人们否认或隐瞒自己的成就或者善意行为,是一种印象管理的方式,可能会对自身的社会认可度及与他人合作相处的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增加他人对自己的信任(Ma et al., 2019)。成年人可以熟练地掌握这种自谦的方式进行印象管理。但是这种沟通方式对于正在进行心理发展的儿童来说,则常常会使他们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承认自己的善意行为或成就可能有助于自我提升的印象管理,另一方面,过度自谦也可能产生使个体降低自身的认同感等负面影响。研究发现,儿童直至 8 岁才开始学会这种谦虚的行为,在此之前,儿童倾向于大方承认自己的善意行为(Banerjee, 2000)。直至 10 岁,儿童才可能真正理解了自己说谎的动机,是出于一种道德意图和印象管理(reputational implication)的目的(Bennett & Yeeles, 1990; Fu et al., 2016a)。此外,文化的影响也十分重要,不同的文化对谦虚的态度也是不同的(Fu, Heyman, & Lee, 2011; Heyman, Itakura, & Lee, 2011; Lee, Xu, Fu, Cameron, & Chen, 2001)。Fu 和他的同事(2016a)考察了 7~11 岁儿童对谦虚的反应,通过询问儿童在学校的自然情境中被询问是否做好事之后,观察其是否会否认自己做过好事,做出谦虚的反应,以此作为

观察儿童是否学会谦虚谎的基本标准。结果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表现出的谦虚程度相对增加,且儿童更倾向于在同龄人面前表现谦虚(与老师在场相比),此外,儿童越认为否认自己的善意行为是正性的,越会倾向于选择制造这种谎言。

综上所述,儿童的谦虚谎行为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相对于其他谎言,起步较晚,大概在儿童中期才会出现,且行为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多。二是其发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成长的文化环境和当时所处的社会情境,具体来说,受中国强调谦虚是美德的文化熏陶的孩子,在同龄人面前更容易否认和隐瞒自己的善意行为。三是儿童的行为和他们对谎言的道德理解密切相关,儿童越认为这种谎言是正性的,越会实施这种行为。然而,已有的范式无法确定儿童是否受其他因素影响而选择隐瞒(例如,害怕老师因为自己动了他的办公室而生气),也没有对其他不太强调谦虚的文化中(如加拿大儿童)的道德理解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

2.2.4 为集体说谎

在成人世界里,尤其是体育、商业与政治领域,为集体说谎的现象到处都是(Fu, Evans, Wang, & Lee, 2008)。儿童在7岁左右开始在道德上理解为集体说谎行为,11岁这种道德理解水平达到与成人一致水平(Fu, Xu, Cameron, Heyman, & Lee, 2007)。儿童的为集体说谎行为与道德理解水平显著相关,他们越觉得为集体说谎在道德上是正义的,越倾向于选择这种行为,因此儿童为集体说谎水平大概在7岁左右出现,11岁成熟(Fu et al., 2008)。此外,儿童是否选择为集体说谎还与集体的规模有关,Fu等(2016b)发现,9至11岁的儿童认为为了班级利益撒谎是最不会被批评的,13岁儿童认为有益于学校的谎言是最不会被诟病的,17岁的青少年认为为了国家利益而撒谎的演讲者是最不会被指责的。最后,为集体说谎行为还与儿童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关,儿童与自己所在的文化接触越多,越倾向于表现出文化习俗一致的行为。在一入学就强调班级文化和以加入少先队为荣誉的中国,儿童的为集体说谎行为符合前人7~11岁儿童的发展规律,然而,在更多强调个人主义的加拿大,儿童7岁时仍认为利己的才是更正性的,且这种利己倾向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由此可见,儿童的为集体说谎行为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为集体说谎行为发展于儿童中期,在

11岁左右达到与成人水平接近。第二,为集体说谎行为与儿童对其的道德理解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第三,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很大,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中,儿童的为集体说谎水平符合发现的规律,而在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儿童的为集体说谎水平发生较晚且发展较慢。然而,目前没有研究对7岁以前的儿童为集体说谎的行为进行探讨,只对儿童的为集体说谎的道德理解的发生发展进行了研究(Fu et al., 2007),因此儿童的为集体说谎行为是否真的在7岁发生尚未可知,有可能出现儿童尚未清楚自己的动机情况下就已经做出了为集体说谎行为。另外,研究者只对中国儿童进行了道德和行为相关的研究,其他文化儿童的道德理解水平和谎言行为是否相关也仍待考察。

综上所述,儿童,甚至是刚刚学会说话的幼儿,也不总是直白地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情感,事实上,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选择和调节自己的语言和非言语行为。但是,并不是所有谎言都是一同发展的,儿童是否制造亲社会谎言与儿童的语言能力、道德理解水平、文化环境都密切相关。事实上,3岁幼儿就可以制造客气谎,5岁儿童可以学会奉承谎,7岁以后才学会谦虚谎和为集体说谎。前两者更多地依赖于个体自身的心理发展水平,而后两者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环境及其对道德理解水平的影响。虽然儿童对以上所述谎言的具体动机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目的——亲社会性,儿童认为说谎话比说真话更积极,更有利于自我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儿童的亲社会谎言的发展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进程。

3 儿童说谎的研究范式

3.1 主动说谎范式

主动说谎范式是在实验过程中创造说谎的机会或在人际互动情景下创造接近真实的说谎场景(白学军等, 2019)。被试在情景下可以自主地选择是否说谎,实验者可以观察到被试更真实的说谎行为(梁静等, 2014)。反社会的主动说谎范式包括诱惑拒绝和竞猜游戏,亲社会谎言的主动说谎范式包括反向胭脂任务、对他人的画作进行等级评分及创造不同的亲社会情境诱发儿童的亲社会谎言行为。

3.1.1 反社会谎言的主动说谎范式

诱惑拒绝(temptation resistance paradigm)是研究儿童说谎的经典范式之一,它多用于观察儿童直接的说谎行为(Evans & Lee, 2013; O'Connor & Ev-

ans, 2018)。其基本操作是给儿童一个具有诱惑性的目标物,随后实验者谎称离开,以观察儿童是否会在在此期间违反承诺去触碰或偷看目标物。实验者返回后会询问儿童是否有违规行为(transgression behavior),以此考察儿童的说谎水平。Lewis, Stranger 和 Sullivan(1989)率先运用这个范式探测 3 岁儿童说谎的情况。实验者要求儿童背对着自己坐在椅子上,并告诉儿童他在玩一个玩具。接下来,实验者假装离开,并告知儿童在他离开期间不允许转身偷看或触摸玩具,等他回来儿童便可以玩玩具。在这期间,儿童往往会抵挡不住玩具的诱惑而违反规则,而实验者通过隐藏的摄像头可以观察到儿童的一切行为。结果表明 38% 的儿童撒谎否认了自己曾偷看或摸过背后的玩具的事实。随后,Polak 和 Harris(1999)都陆续沿用并改良了该范式。与 Lewis 等人不同,他们的玩具会发出声音,这与单纯地告知儿童其身后有玩具更具诱惑性。Talwar 和 Lee(2008)继续改进该范式,将诱惑性的目标物从玩具换成了某项测试的答案,以此探究小学生撒谎行为与心理理论的关系。儿童心理理论指的是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的一种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解能力,是儿童社会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Ding, Wellman, Wang, Fu, & Lee, 2015)。近年来,Evans 和 Lee(2013)进一步改进该范式,将诱惑性的目标物直接放在了儿童面前,要求儿童不能偷看杯子里的东西,如果儿童偷看了,杯子里的东西就会洒出,这样做的目的是进一步探究儿童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的说谎策略,从而探索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诱惑拒绝的范式操作简单,并且能够在基本的操作基础上延伸出许多不同的方法,以便探究更多样性的儿童说谎行为,是诱发儿童自主说谎的最佳范式之一。

诱惑拒绝范式的特点在于用一个对儿童具有诱惑力的事物来诱发儿童的目标行为。该范式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引诱儿童自发的说谎行为(Talwar & Lee, 2008),并模仿了存在儿童说谎趋势的自然情境(Newton, Reddy, & Bull, 2000)。该范式可以通过观察儿童直接的说谎行为,探讨儿童的心理理论、执行功能等认知功能及对说谎的道德认知与说谎行为的关系。

竞猜游戏范式的提出则是为了进一步研究儿童的欺骗行为与心理理论的关系(Ding et al., 2014)。实验者告诉儿童玩一个竞猜游戏,规则是猜测屏幕上哪一边(左边或右边)会出现硬币,他们不需要口

头说出答案,而是在实验者看不见的桌子下方伸出相应的手即可,此时桌子下方早已用隐藏的摄像头记录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随后,主试问儿童是否预测正确,如果正确则会得分,错误就会失分。此时,儿童为了得分可能会故意欺骗实验者,说自己预测正确,隐瞒他们预测是错误的真相。

竞猜游戏范式的优势在于它用了更科学的实验方法去探究儿童的说谎或者欺骗行为,与诱惑拒绝的范式所使用的观察法相比,竞猜游戏的实验法更能分析出儿童的反社会谎言行为与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等的发展关系。用此类范式探究儿童时期的欺骗行为,有助于预测未来青少年或成年期的犯罪倾向或其他行为问题出现的概率。此外,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探索,儿童对概率的理解是否有助于减少欺骗行为,即当儿童认识到他们猜错的机会是随机的,并且与他们的能力无关时,欺骗动机是否会减弱。

在竞猜游戏之后,研究者们又想进一步考察社会互动情境下儿童的竞猜游戏的特点,面对面猜硬币指的是由儿童将硬币藏于左手或右手,由主试询问“请你告诉我硬币在左手还是右手呀?”,儿童的实验任务是采用说真话和说谎的交叉策略迷惑对方,使得对方猜错。因此,在该任务中,儿童的说真话和说谎话都被认为是一种欺骗的手段,这种行为也被称作高级欺骗(sophisticated deception)或者二级欺骗(second-order verbal deception)(Ding et al., 2014; Volz, Vogeley, Tittgemeyer, von Cramon, & Sutter, 2015)。

综上所述,研究儿童反社会谎言的主动说谎的范式包括诱惑拒绝和竞猜游戏。诱惑拒绝是最早的研究范式之一,主要用于直接观察儿童的说谎行为,后期有学者运用该范式研究儿童说谎与心理理论水平发展的关系,竞猜游戏则是为了进一步探讨二者关系。考虑到说谎在真实情景中具有社会互动的特点,因此,研究者又改良了竞猜游戏,充分探讨在博弈当中,欺骗者和被欺骗者的语言和非语言互动行为。这三者都是研究儿童反社会谎言的行为,但又层层递进,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且有效的范式。

3.1.2 亲社会谎言的主动说谎范式

研究客气谎的方法主要是创造礼貌性情境,考察儿童在该情境中是否会说谎。以往研究主要创造了三种情境。第一种情境——反向胭脂任务,其主要操作过程为,主试在鼻子上用胭脂画一个红点,儿

童不知情是主试故意所为,且儿童认为鼻子上有红点是难看的,由主试询问儿童“我这样好看吗?”,观察儿童是否会出于礼貌而说出违背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好看”之类的话语(Talwar & Lee, 2002)。第二种情境是“不期待的礼物”范式,由主试给予儿童一个他们不喜欢的礼物,观察儿童是会直接拒绝还是欣然接受,并伪装出自己很喜欢的反应(Talwar, Murphy, & Lee, 2007)。第三种情境是让儿童对同伴的画作进行评分,观察儿童是否会出于维护同伴的面子而虚伪地夸赞其画作好看(Fu & Lee, 2007)。

研究奉承谎的方法与客气谎的第三种情境类似,但对象进行了更换。该任务要求儿童对成人的画作进行评定。其基本操作是,儿童被单独带到相邻教室的老师的办公室,告知他们需要不同的画进行评定,这些画有的是老师画的,有的是同龄人画的,儿童需要对画作进行7点计分评定,三颗星星 = “非常好”,两颗星星 = “好”,一颗星星 = “一点点好”,一个圆 = “不好也不坏”,一个× = “一点点不好”,两个× = “不好”,三个× = “非常不好”。儿童一共需要对9幅画进行评分,三幅质量很差,三幅质量中等,三幅质量优秀。主试选取儿童评分为中等的两幅画,并借故离开办公室。接着邀请儿童不熟悉的,声称是隔壁班的两名老师的实验人员(一男一女)进入房间,询问儿童“这幅画是我画的,你能为我打分吗?”,儿童在权威人物在场的情况下需要对该幅画作进行二次评分,运用房间内隐藏的摄像头和主试观察儿童的语言、行为和表情反应,进行标准化记录(Fu & Lee, 2007)。

对谦虚谎的研究则是创造一个“凌乱办公室”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儿童必须决定是公开还是隐瞒一件好事。在实验过程中,一名实验人员以给学生做认知测试为借口,在学校里单独观察他们,然后实验者将不知情的儿童带进一间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地上散落着皱皱巴巴的文件,在交谈的过程中实验人员一直对房间的脏乱程度进行抱怨并且用言语暗示“我真希望有人能帮我打扫一下这个房间”,直至儿童真正打扫了房间。当儿童完成后,实验者感谢了儿童的帮助并找借口离开,一名声称是这间办公室主人的该学校老师进入,并对房间的整洁度表示惊讶和感叹,并用言语暗示“谁帮我做了这些呢?真是个大好人”,给予停顿,并观察儿童反应。如儿童无反应,询问儿童“你知道是谁帮我清理了办公室吗?”如果儿童没有否认,则继续询问“是你

帮我清理了办公室吗?”,用隐藏的摄像头观察、记录儿童的行为、语言、表情反应(Fu, Heyman, & Lee, 2011)。

为他人说谎研究的情境设定多在群体情境中,而且并不是直接考察儿童的行为,而是考察他们为他人说谎行为的道德判断。研究者给儿童讲述8个故事,其中6个故事从班级、学校和国家三个层次描述了要么说谎有利于集体利益,或者违背利益说出真相。即主人公讲述:(1)一个有利于班级的谎言;(2)一个有利于学校的谎言;(3)为国家利益而说谎;(4)实话实说却损害了班级利益;(5)诚实但是损害了学校利益;(6)讲真话危害了国家利益。故事情境都设定在体育、科学竞赛或者语言比赛(辩论和拼写任务)等集体活动中。例如,在篮球比赛中,主人公参加不同学校间的高中篮球比赛,对方队伍发现主人公所在队伍里有一名其实是大学的熟练篮球运动员,然后教练询问主人公那个人是否真的是高中球员,主人公考虑到队伍的利益选择说谎或实话实说损害了自己队伍赢的几率。另外2个故事则是考察儿童是否因为个人利益选择说谎作为控制变量(如摔坏电脑或打破窗户,坦白自己的错误还是掩饰以避免赔偿和责骂)。儿童需要对不同的故事情境对主人公的表现进行7点评分,“非常非常好”(三颗红星)、“非常好”(两颗红星)、“好”(一颗红星)、“不好也不坏”(一个蓝色圆圈)、“坏”(一个×)、“非常坏”(两个×)、“非常非常坏”(三个×)。对儿童的量表评分进行统计分析从而考察儿童为他人说谎的水平(Fu et al., 2016b)。

3.2 被动说谎范式

被动说谎范式指被试按照主试的要求或提示线索说谎(梁静等, 2014),本文采用梁静等(2014)的分类,认为儿童被动说谎的研究范式分为差异性欺骗范式(differentiation of deception paradigm, DDP)、信念性说谎范式(opinion lies)和情绪性说谎范式(emotional lies)三种。差异性欺骗范式包括卡片测试和个人真实信息测试。卡片测试范式要求被试抽取扑克牌,然后回答主试的问题,如“这张牌是红桃5吗?”,被试否认自己关于抽取的牌的正确信息就是说谎(Bhutta, Hong, Naseer, & Khan, 2014)。个人真实信息测试与卡片测试形式上无差异,一般在实验前先收集被试的个人信息,如果否认个人真实信息就是说谎(Lin, Sai, & Yuan, 2018)。这种类型范式的本质是意图性地,有策略地否认正确信息,也称

为故意错误范式(intentional false responding),它易于在实验室中进行操作,也能较好地控制无关变量(崔茜,蒋军,杨文静,张庆林,2013)。

信念性说谎范式则需要被试对自己坚持的某种强烈信念或观点说谎(梁静等,2014),最典型之一的就是假装失忆范式,被试任务是学习再认,其基本要求是让被试有意将明明已经学过的或者看到过的东西说成没学过或者见过,而又不能对所有测试项目都只是简单地做出相反的错误反应,而是要尽可能地使用策略,不让人发现是在伪装(李放等,2016;Li et al.,2015)。结果主要比较被试在真实肯定和虚假表达时外在行为和内隐生理、神经活动的不同反应。但是目前这种范式在实验室中,被试的假装行为都是根据主试的指导语诱发的,是一种被动说谎行为,未来应该继续改进测量个体在自然情境中的假装行为。

情绪性说谎范式是由主试诱发被试的某种情绪,但却要求被试做出与诱发表情相反的表情(梁静等,2014)。主要有3种伪装方式,分别是模拟(stimulating)、掩饰(masking)和中性化(neutralizing)(Porter & ten Brinke,2008)。模拟是表达假情绪,如看到中性图片而做出高兴的表情,掩饰是用假表情代替真实的表情,比如看到伤心图片却做出高兴的表情。而中性化则是看到任一情绪的图片都保持面无表情状态。这类说谎策略在生活中经常使用,如人们在聚会时经常使用该原理的游戏来调节聚会的气氛。与文字的学习任务相比,该范式的优点是消耗被试较少的认知资源,但其引起的真实情绪的程度由于个体差异而难以控制。

被动说谎和主动说谎的本质区别在于,被动说谎个体是在主试的指导下缺乏自主动机的说谎,而主动说谎范式则很好地给被试创造了一个选择是否说谎的环境,让被试有自由选择说谎还是说真话的权利,这类范式更符合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说谎表现。此外,被动说谎和主动的脑激活模式也不同,人际交往互动场景中,自发说谎显著地激活了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STS)脑区(Tang et al.,2015;Zhang et al.,2017),fNIRS研究发现在脑网络上主动说谎范式比被动说谎范式表现出更大的平均节点、较小的平均路径和更大的聚类系数等“小世界”属性(Ding, Wu, Liu, Fu, & Lee,2017;Zhang et al.,2016)。

4 未来与展望

本文主要回顾了关于儿童说谎行为的一些研究,包括儿童谎言的类型与用于研究儿童说谎的实验范式。但是,关于儿童说谎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这里提出以下几点不足及对未来的展望。

首先,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实验范式。比如,在使用诱惑拒绝范式时,应尽可能避免误差影响。许多学者都对儿童说谎行为的出现感兴趣,并采用“不准触摸玩具”的范式对2~3岁的儿童进行研究。但有研究表明,2岁儿童会表现出一种肯定倾向,即对所有的问题都作肯定的回答(Fritzley & Kang,2003)。所以当询问儿童“你是否转身碰了玩具?”时,说谎的概率会降低,对此,可以增加2~3岁年龄段儿童的数量,尽可能避免肯定倾向所带来的误差影响。此外,关于亲社会谎言的研究范式的发展还较少,尽管有大量研究关注了客气谎的行为(Broomfield, Robinson, & Robinson, 2011; Ma, Xu, Heyman, & Kang, 2011; Warneken & Orlins, 2015),然而,对于其他三种近年才提出的说谎类型,即奉承谎、谦虚谎和集体谎的研究还较少,并且,对于为集体说谎的研究还集中在道德判断层面,而非具体的行为层面,其发生的年龄和机制也尚未清楚;对于奉承谎的研究除了行为发展水平外,其动机、道德发展、影响因素等都尚未可知。研究亲社会谎言对于儿童对复杂社会的适应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都值得研究者关注。

在观察儿童的说谎行为时,应规范地进行客观记录,避免主试的主观偏见和主观臆测。在亲社会情境的范式中,需要对主试进行严格的培训和指导语的训练,才能确保实验的顺利进行。此外,鉴于瞳孔直径的放大或缩小和注视时间的长短可以反映行为信息,梁静等(2014)提出,可以通过眼动仪记录眼部线索来记录儿童的说谎行为。李康和他的同事近年正在研究一种新兴的成像技术,即光谱光学成像技术,运用手机摄像头就可以监测儿童说谎(Liu, Luo, Zheng, Jia, & Kang, 2018)。其基本原理是,人的面孔下有丰富的血管网络,当体验不同情绪时,人的血流会发生变化,比如儿童说谎的时候,其脸颊的血流会下降,鼻子的血流会上升,因而也被戏称为“匹诺曹效应”。通过这种办法,就可以直接观察儿童是否在说谎,然而这种技术仍在开发阶段,需要不断地改善和推广才能应用。

第三,除了行为水平的直接观察和心理过程的

评估外,关注说谎行为的神经网络有利于扩展我们对谎言发生和发展机制的理解。许多时候,说谎是一种他人难以发觉的自主行为,且每个人的行为方式都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因此不同说谎行为的特点和差异需要依靠探测大脑内部网络活动的特征和差异去分析。说谎行为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过程,需要多个大脑功能区域的参与(Ding et al., 2017)。考察说谎行为下被试大脑的激活区域和功能连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说谎时不同大脑区域的激活程度和特点,更接近说谎的本质。此外,对不同类型谎言对应的内在神经机制进行考察,也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对这些谎言进行区分及发现谎言之间的一般性规律。

第四,开展儿童说谎行为的纵向追踪研究,尤其是对低龄儿童,其说谎行为还未发生或者才刚刚出现,可以在较长时间内观察同一儿童的儿童说谎发展特点。当前学者多倾向于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进行横向对比,而纵向研究则较少。对儿童说谎的外显行为和内隐的神经机制进行追踪考察,有利于解释儿童的说谎行为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及其与内在的大脑发育的关系(Lisofsky et al., 2014),从而加深我们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认识。

第五,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特殊儿童的说谎行为,对特殊儿童谎言的行为研究可以与正常儿童的发展进行对比参照,从而知道其中的影响机制。例如,自闭症儿童对亲社会谎言和其他亲社会行为的道德理解的差异会影响他们的说谎行为(Decety, Cowell, Lee, Mahasneh, & Zhou, 2015; Yi et al., 2014),但是这些研究都属于起步阶段,对特殊儿童的说谎行为发生发展水平的研究可以通过与正常儿童进行对比,更好地说明影响说谎的要素。例如,自闭症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交往能力的不足或缺失,而说谎行为是社会交往中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因此,对自闭症儿童的谎言行为的关注也有利于对他们疾病的干预与治疗。

参考文献

- 白学军,章鹏,张琪涵,宋璐,杨宇.(2019).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在说谎研究中的应用.《心理科学进展》,27(1),160-170.
- 崔茜,蒋军,杨文静,张庆林.(2013).欺骗的神经机制和测谎应用:来自fMRI研究的证据.《心理科学进展》,21(9),1629-1642.
- 梁静,李开云,曲方炳,陈宥辛,颜文靖,傅小兰.(2014).说谎的非言语视觉线索.《心理科学进展》,22(6),995-1005.
- 刘秀丽,史华一,张娜.(2016).儿童白谎的研究回顾.《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46-151.
- Banerjee, R. (2000). The development of an understanding of modesty.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8, 499-517.
- Beeson, W. L., Abbey, D. E., & Knutsen, S. F. (2011). When all signs point to you.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7(12), 813-822.
- Bennett, M., & Yeeles, C. (1990).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showing off.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0, 591-596.
- Bhutta, M. R., Hong, K. S., Naseer, N., & Khan, M. J. (2014). Hemodynamicsignals based lie detection using a new wireless NIRS syste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13th the Society of Instrument and Control Engineers* (pp. 979-984). Sapporo, Japan.
- Broomfield, K. A., Robinson, E. J., & Robinson, W. P. (2011).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about white lies.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 47-65.
- Bussey, K. (1999). Children's categorization and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lies and truths. *Child Development*, 70(6), 1338-1347.
- Decety, J., Cowell, J. M., Lee, K., Mahasneh, R., & Zhou, X. (2015). The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religiousness and children's altruism across the world. *Current Biology: CB*, 25(22), 2951-2955.
- Ding, X. P., Heyman, G. D., Sai, L. Y., Yuan, F., Winkielman, P., Fu, G. Y., & Lee, K. (2018). Learning to deceive has cognitive benefi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76, 26-38.
- Ding, X. P., Omin, D. S., Evans, A. D., Fu, G., Chen, G., & Lee, K. (2014).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s cheating behavior and its cognitive correlat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21(1), 85-95.
- Ding, X. P., Wellman, H. M., Wang, Y., Fu, G., & Lee, K. (2015). Theory-of-mind training causes honest young children to li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11), 1812.
- Ding, X. P., Wu, S. J., Liu, J., Fu, G., & Lee, K. (2017). Functional neural networks of honesty and dishonesty in children: Evidence from graph theory analysis. *Scientific Reports*, 7(1), 12085.
- Downey, J. E. (1929). Studies in deceit.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2(2-3), 385-389.
- Evans, A. D., & Lee, K. (2013). Emergence of lying in very young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9(10), 1958-1963.
- Fritzley, V. H., & Kang, L. (2003). Do young children always say yes to yes-no questions? A meta developmental study of

- the affirmation bias. *Child Development*, 74(5), 1297 – 1313.
- Fu, G. Y., Brunet, M. K., Lv, Y., Ding, X. P., Heyman, G. D., Cameron, C. A., & Lee, K. (2010). Chinese children's moral evaluation of lies and truths – roles of context and parental 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 tendencies.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19(5), 498 – 515.
- Fu, G., Evans, A. D., Wang, L., & Lee, K. (2008). Lying in the name of the collective good: A developmental study. *Developmental Science*, 11(4), 495 – 503.
- Fu, G., Heyman, G. D., & Lee, K. (2011). Reasoning about modesty among adolescents and adults in China and the U. 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4, 599 – 608.
- Fu, G., Heyman, G. D., & Lee, K. (2016a). Learning to be unsung heroes: Development of reputation management in two cultures. *Child Development*, 87(3), 689 – 699.
- Fu, G., & Lee, K. (2007). Social grooming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emergence of flattery behavior. *Developmental Science*, 10(2), 255 – 265.
- Fu, G., Luo, Y. C., Heyman, G. D., Wang, B., Cameron, C. A., & Lee, K. (2016b). Moral evaluations of lying for one's own group. *Infant & Child Development*, 25(5), 355 – 370.
- Fu, G., Xu, F., Cameron, C. A., Heyman, G., & Lee, K. (2007). Cross –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choices, categorizations, and evaluations of truths and li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3, 278 – 293.
- Goodman, G. S., Myers, J. E. B., Qin, J. J., Quas, J. A., Castelli, P., Redlich, A. D., & Rogers, L. (2006). Hearsay versus children's testimony: Effects of truthful and deceptive statements on jurors' decision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30(3), 363 – 401.
- Green, S. P. (2004). Cheating. *Law and Philosophy*, 23(2), 137 – 185.
- Helwig, C. C., & Turiel, E. (2011). *Children's social and moral reasoning*. Wiley – Blackwell.
- Heyman, G. D., Itakura, S., & Lee, K. (2011). Japanese and American children's reasoning about accepting credit for prosocial behavior. *Social Development*, 20, 171 – 184.
- Higgins, C. A., Judge, T. A., & Ferris, G. R. (2003). Influence tactics and work outcomes: A meta – analysi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4, 195.
- Lee, K. (2013). Little liars: Development of verbal deception in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7(2), 91 – 96.
- Lee, K., Xu, F., Fu, G., Cameron, C. A., & Chen, S. (2001).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ese and Canadian children's categorization and evaluation of lie – and truth – telling: A modesty effect.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 525 – 542.
- Leekam, S. R. (2004). Reconstructing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mind: Reflections from the study of atypical development.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7(1), 113.
- Lewis, M., Stanger, C., & Sullivan, M. W. (1989). Deception in 3 – year – old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5(3), 439 – 443.
- Lewis, M. (2015). The origins of lying and deception in everyday life. *American Scientist*, 103(2), 128 – 135.
- Li, Z., Heyman, G. D., Lulu, C., Wenjin, S., Rui, Z., & Kang, L. (2019). Cheating in the name of others: Offering prosocial justifications promotes unethical behavior in young childre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77, 187 – 196.
- Lin, X., Sai, L., & Yuan, Z. (2018). Detecting concealed information with fused electroencephalography and functional near – infrared spectroscopy. *Neuroscience*, 386, 284 – 294.
- Liu, J., Luo, H., Zheng, P. P., Jia, W. S., & Kang, L. (2018). Transdermal optical imaging revealed different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facial cardiovascular activities. *Scientific Reports*, 8(1), 10588 – 10601.
- Ma, F., Heyman, G. D., Li, X., Xu, F., Compton, B. J., & Kang, L. (2019). Modesty can promote trust: Evidence from China. *Social Development*, 28, 218 – 233.
- Ma, F., Xu, F., Heyman, G. D., & Kang, L. (2011). Chinese children's evaluations of white lies: Weighing the consequences for recipi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08(2), 308 – 321.
- Newton, P., Reddy, V., & Bull, R. (2000). Children's everyday deception and performance on false – belief tasks.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8, 297 – 317.
- O' Connor, A. M., & Evans, A. D. (2018). The relation between having siblings and children's cheating and lie – telling behavio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68, 49.
- Peskin, J. (1992). Ruse and representations on children's ability to conceal inform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8(1), 84 – 89.
- Polak, A., & Harris, P. L. (1999). Deception by young children following noncomplia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5(2), 561 – 568.
- Porter, S., & tenBrinke, L. (2008). Reading between the lies: Identifying concealed and falsified emotions in universal facial express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5), 508 – 514.
- Talwar, V., & Lee, K. (2002). Emergence of white – lie telling in children between 3 and 7 years of age. *Merrill – Palmer Quarterly* (1982), 48(2), 160 – 181.
- Talwar, V., Lee, K., Bala, N., & Lindsay, R. C. L. (2002). Children's conceptual knowledge of lying and its relation to their actual behaviors: Implications for court competence examinations. *Law & Human Behavior*, 26(4), 395.
- Talwar, V., Gordon, H. M., & Lee, K. (2007). Lying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years: Verbal decep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sec-

- ond – order belief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3(3), 804 – 810.
- Talwar, V., Murphy, S. M., & Lee, K. (2007). White lie – telling in children for politeness purpo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1(1), 1 – 11.
- Talwar, V., & Lee, K. (2008). Social and cognitive correlates of children's lying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79(4), 866 – 881.
- Volz, K. G., Vogeley, K., Tittgemeyer, M., von Cramon, D. Y., & Sutter, M. (2015). The neural basis of deception in strategic interactions.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9, 27.
- Warneken, F., & Orlins, E. (2015). Children tell white lies to make others feel better.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3(3), 259 – 270.
- Wilson, A. E., Smith, M. D., & Ross, H. S. (2010).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young children's lies. *Social Development*, 12(1), 21 – 45.
- Xu, F., Bao, X., Fu, G., Talwar, V., & Lee, K. (2010). Lying and truth – telling in children: From concept to action. *Child Development*, 81(2), 581 – 596.
- Yi, L., Fan, Y., Li, J., Huang, D., Wang, X., & Tan, W. (2014). Distrust and retaliatory deception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Research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8(12), 1741 – 1755.

Types of Children's Lying Behavior and Its Paradigms

Dai Yuqian^{1,3}, Qiu Hua², Li Hong³

(1. School of Psychology,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2. Experimental School Affiliated to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3. Institute of Brai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Abstract: Ly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ying behavior is conducive to their cognitive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of social moral norms, and to help them better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Reviewing the existing types of children's lying, which includes anti – social lies and pro – social lies, introducing paradigms of children lying research, which includes passive lying paradigms and active lying paradigms and pointing out future direction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such as modifying paradigms, increasing the study of pro – social lies and research on special children's lies, could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hildren's lying.

Key words: children; anti – social lie; prosocial lies; paradigm of lying behavior